

## 李白赠孟浩然诗发微

□ 曾智安

**摘要:**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两首作品看似深情热烈,实际上都是蹈袭自己旧作或前人作品而成,带有矫饰色彩。而孟浩然在人际交往中机警敏感,非常在意情感的本质真诚。两人的社交个性适为对立,这可能才是孟浩然不回应李白的根本原因。本文据此进一步对唐代士人的出处成败与其社交能力的关系加以探讨。

**关键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社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7)05-0108-08

李白集中题赠孟浩然诗凡五首:《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淮海对雪赠傅霁(一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以及《春日归山,寄孟浩然》。其中后三首是否确为李白赠孟浩然所作一直备受争议,且其艺术成就不太突出,暂且可以不论。但《赠孟浩然》、《送孟浩然之广陵》两诗情感强烈,光英朗练,千古以为佳作。李白高视一世,极少对人推许如此,由此似乎颇可见出李白对孟浩然的认同。<sup>①</sup>但孟浩然所存200多首诗歌中,不仅不见对李白的酬答,甚至几乎没有文字涉及李白。这与通常的交友之道似乎不合。<sup>②</sup>而且孟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其文集自天宝四载(745年)即有王士源着手进行编辑。虽然其“篇章散逸”,但“诗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录次而不弃耳”<sup>③</sup>,作品的收集较为及时。此时距离孟浩然去世不过五年,而李白早已名动天下。如果孟浩然有诗作涉及李白,其文集或许不至于漏收如

此。故后世学者或感困惑,并有所讨论。<sup>④</sup>今偶检唐诗,略有小得,并以为其中关涉较多,且试为新论。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二人情感投入看似极不对等。从《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两首作品来看,李白对孟浩然的情感极其真挚、热烈,但孟浩然似乎无动于衷。此中的真正缘由可能永远无法确晓。但如果从李白这两首作品的具体创作情境切入,则孟浩然的奇怪态度或者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李白这两首作品的创作情境均较为独特。其中《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已经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可以作为探讨的开始: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sup>⑤</sup>

**作者简介:**曾智安(1976-),湖北公安人。文学博士,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乐府学及唐代文学研究。

就艺术水准而言,此诗化用典故而巧妙自然,寄情象外而深情曲折,实非一般作品可比。<sup>⑥</sup>前人对此诗倍为推崇,甚至有“送别诗之祖”一说。<sup>⑦</sup>但如果从具体的创作情境考虑,则这首作品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俞陛云的相关解说切入:

送行之作夥矣,莫不有南浦销魂之意。太白与襄阳,皆一代才人,而兼密友,其送行宜累笺不尽。乃此诗首二句,仅言自武昌至扬州。后二句叙别意,言天末孤帆,江流无际,止寥寥十四字,似无甚深意者。盖此诗作于别后,襄阳此行,江程迢递,太白临江送别,直望至帆影向空而尽,惟见浩荡江流,接天无际,尚怅望依依,帆影尽而离心不尽。十四字中,正复深情无限,曹子建所谓“爱至望苦深”也。<sup>⑧</sup>

俞陛云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此诗情感抒发的关键点,即“帆影尽而离心不尽”。李白的“深情无限”正是通过这一点而得以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俞陛云还给出了一个推断:“盖此诗作于别后”。其实李白这首诗的标题明言“送孟浩然之广陵”,按照送别诗的惯例,自当是离别前所作,为何俞陛云要特意拈出“盖此诗作于别后”?此诗作于“别前”或“别后”,究竟有何差异?

这是因为,如果此诗确实是两人分别前所作,则不仅不能见出李白的“深情无限”,反而足以证明李白此诗、此情之矫饰。从根本上说,《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一首基于应酬的送别诗。关于这种应酬诗歌的讲究,清人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第六十二条有云:

钱郎赠送之作,当时引以为重。应酬诗,前人亦不尽废也。然必所赠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自然可咏可歌,非幕下张君房辈所能代作。<sup>⑨</sup>

应酬活动并不一定都出于真情,但却非常忌讳明显的虚伪。沈德潜说“然必所赠之人何人,

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复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正是强调了这类应酬诗情感的抒发必须以对基本事实的真诚作为基础,故而不能由人随意代作,否则就会带来负面的社交后果。以此反观李白的这首作品,可知其正是难免此类嫌疑:如果此诗确实是离别前所作,则“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情境根本还未发生,全是虚构之辞;进而其“帆影尽而离心不尽”的情感抒发也就不是触景而生,而是为文而造情。<sup>⑩</sup>俞陛云特意推断“盖此诗作于别后”,应该正是意识到了这一令人尴尬的情境。尽管这种推断并无依据。

可能令俞陛云料想不及的是,即使这首作品就是“作于别后”,也无助于维护李白的“深情无限”形象。事实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乃是李白蹈袭自己于开元十三年前后创作的一首旧作,即《江夏行》中的四句: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sup>⑪</sup>

这四句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相似之处一望便知。后者显然是蹈袭前者而来。李白只不过将其中的商人和商人妇替换为孟浩然与自己而已。对此阮堂明揭示得最为清楚。他指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所描写的临江送别场景:

是李白从《江夏行》中借鉴过来的。因此诗人之临江伫立,凝神远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在送孟浩然时的当下感受与经历。<sup>⑫</sup>

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李白“一再地将《江夏行》中‘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所体现的情景用之于后来创作”的现象。这意味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深情无限”源于一个固定的表达模式,并且被李白多次表现于不同的场合。类似于一篇反复发给多人的精美情书,虽然细节随时有所调整,但套路基本一致。

更重要的是,孟浩然很可能事先已经知晓了李白的《江夏行》。《江夏行》和《黄鹤楼送孟浩

然之广陵》的创作时间虽然多有争议,但后者脱胎于前者的痕迹至为明显。《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应当是创作于《江夏行》之后。<sup>⑮</sup>而且,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可见二人此前已有交往。江夏于孟浩然为乡里,于李白为客土。从社交常情推测,李白作的《江夏行》很可能会流传到“故人”孟浩然那里。另外,李白《江夏行》中的这四句实际上还受到了南朝西曲《莫愁乐》、《三洲曲》等曲辞的影响。<sup>⑯</sup>襄阳是西曲重要的发源地之一<sup>⑰</sup>,也正是孟浩然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浩然对李白此诗“深情无限”的来历洞若观火,其不作积极回应也在情理之中。

《赠孟浩然》其实也存在着同样问题,只不过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注意:

李白《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从此揖清芬。

诗歌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直接表白发端,后面各句明丽爽朗,畅快淋漓,给人以深情激荡、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之感。历来论二人交情者多推重此诗。如宋刘克庄以为:“世谓谪仙眼空四海,然《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则尽尊宿之敬。”<sup>⑱</sup>今人更有多方解读。<sup>⑲</sup>但此诗似乎也没有得到孟浩然本人的积极回应。邝健行以为这与李白并不真的了解孟浩然有关。<sup>⑲</sup>实则问题还不在此。

《赠孟浩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也是一首蹈袭之作。宇文所安认为李白的这首作品“从头至尾模仿了孟浩然自己的诗歌,仿佛为了证明诗中的形象确是孟浩然”。<sup>⑳</sup>似乎李白是特意用蹈袭孟浩然诗句的方式而向对方致敬。但事实并不如此。实际上,李白这首作品主要蹈袭自陈子昂《感遇》其十的前半部分:

陈子昂《感遇》其十(前八句)

吾爱鬼谷子,清溪无垢氛。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七雄方龙斗,天下乱无君。  
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岂图山木寿,空与麋鹿群。<sup>㉑</sup>

两诗都是对隐士风尚的赞颂,都称道对方远离人世,遗身于白(松)云之外。其间的模式感不言而喻。更令人难堪的是,“吾爱孟夫子”这句真情激荡的开端语直接化用自陈子昂的“吾爱鬼谷子”,可见其有源有本,并非由衷而出;甚至李白原诗的第二、三联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对陈子昂原诗对应位置的步韵:二者都落在“云”、“君”两字上。此外,李白的结句“从此揖清芬”也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陈子昂诗歌的第二句“清溪无垢氛”,其第二句结字“闻”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陈子昂诗歌第八句的结字“文”。将两诗相关部分做一图表,可以将这些内容显示得更为清楚:

李白《赠孟浩然》	陈子昂《感遇》其十(前八句)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吾爱鬼谷子,清溪无垢氛。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七雄方龙斗,天下乱无君。
高山安可仰,从此揖清芬。	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很明显,李白此诗不仅抒情模式与陈子昂《感遇》其十接近,而且其文辞与修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截取陈子昂该作的前八句变化而成,蹈袭痕迹十分明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受陈子昂的影响极大。其组诗代表作《古风》与陈子昂的《感遇》颇多相似之处,其它篇章“或多或少也受到了《感遇》和陈子昂其它诗作的影响”。<sup>㉒</sup>这可以进一步说明《赠孟浩然》对陈子昂《感遇》其十的蹈袭。

李白的这种蹈袭极有可能被孟浩然洞悉。按陈子昂活跃于武周年间,较孟浩然年长三十岁左右。《感遇》为陈子昂代表作,在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旧、新《唐书》本传皆载陈子昂以《感遇》诗成名。其中以《新唐书》所载更为详细:

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乃请交。子

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梓州,而学堂至今犹存。<sup>②</sup>

尽管罗庸对陈子昂以《感遇》诗知名的说法提出了一定质疑<sup>③</sup>,但《感遇》作为陈子昂的代表作受到唐人推崇则是事实。<sup>④</sup>除李白的《古风》外,张九龄的《感遇》也是直接效仿陈子昂。宇文所安即认为,“张九龄的《感遇》是体现陈子昂影响的最显著范例”。<sup>⑤</sup>据常理推测,孟浩然应该对陈子昂的代表作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孟浩然很可能直接从张九龄处深刻体会到了陈子昂《感遇》诗的精神内涵。按张九龄的《感遇》多作于其开元二十五年被贬荆州之后<sup>⑥</sup>,寄寓着他遭受政治打击后的深沉感慨,与陈子昂《感遇》的精神旨归高度契合。而孟浩然与张九龄本为旧识。开元二十五年,他更是直接进入张九龄的幕府,与其多有交游、唱和。<sup>⑦</sup>故而孟浩然对张九龄的政治遭遇及其《感遇》诗歌的创作背景当有不同于常人的深切感受。而李白创作《赠孟浩然》的时间,学界大多认为是在孟浩然从张九龄荆州幕府辞归以后。<sup>⑧</sup>据此可见,孟浩然对李白这首诗歌的源本及变化同样明察秋毫,故而也就谈不上被其感动。

应该指出,如果仅就艺术成就而论,不管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还是《赠孟浩然》,相较于它们蹈袭的对象,无疑都属于后出转精之作。但不容回避的是,这两首作品都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社交生活中的应酬诗。它们的艺术价值与社交功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艺术效果上的深情真挚并不能掩盖社交活动中的刻意与做作。李白这两首作品不仅是以蹈袭之举而故作深情,而且是投赠长者,其效果可以想见。

## 二

而孟浩然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学界的关注重点主要在其出仕与归隐行为及其间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心态。只有较少的学者注意到了孟浩然一些其他的个性特征,如“拙”、狷洁、任侠、好交游、意气感激及脱略行迹等。<sup>⑨</sup>事实上,如果能够综合考虑孟浩然在人际交往中所

显示出来的个性特征,可能就会对其与李白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

关于孟浩然的个性特征,以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记载最为直接,也最为全面。其中的一段文字值得特别注意:

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也。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sup>⑩</sup>

王士源是孟浩然的同时人,而且是他的崇拜者。在孟浩然死后,王士源对他的作品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sup>⑪</sup>他对孟浩然生平及个性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可惜的是这段文字一直没有引起后世学者的充分注意。事实上,“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这样的表述很少出现在人物传记里,很有可能是王士源对孟浩然个性及人际交往特点的有意标示。从情理推测,“通脱倾盖”意在说明孟浩然待人接物时意气感激,即使初次相识也会以诚相待,不为世俗礼法拘束;“机警无匿”则意在指出孟浩然在交游之中机敏警觉,善于洞悉他人微妙的情感变化和内心波动,而且也不藏匿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通脱”。换言之,孟浩然在人际交往中一方面可能非常率性,另一方面也可能非常敏感,而且两者交织在一起,互为影响。

关于孟浩然的这一个性特征,今天已经很难有直接的材料予以证明。然而也并非全无痕迹可循。张子容是孟浩然诗集中出现较多的酬唱人物,两人关系非同一般。<sup>⑫</sup>但孟浩然在《送张子容赴举》中却说道:“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消,须令友道存。”<sup>⑬</sup>在送好友“赴举”之际,不是深切祝福,而是直接告诫对方勿以地位的变化而致友道有亏,言语之直接、尖锐令人诧异,真可谓“无匿”。从常理推测,孟浩然的这种反应很可能与他的“机警”,即对张子容某些言行的敏感有关。二人后来于某年除夕在张子容的贬所乐城相逢。<sup>⑭</sup>张子容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自己对孟浩然的招待:

远客襄阳郡,来过海畔家。樽前柏叶

酒,灯发九枝花。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东山行乐意,非是竞奢华。<sup>⑧</sup>

在诗歌的末尾,张子容特意对孟浩然说明,自己对他的招待是仿效谢安在东山行乐之意<sup>⑨</sup>,而不是有意在旧友面前夸饰排场。张子容的这一举动同样非常奇特,然而并非不可理解。对于这次见面,孟浩然的定位是:“予是乘桴客,君为失路人。”<sup>⑩</sup>即认为二人都处于失意之境,寓有同病相怜之意。但张子容即使处于贬中,其处境也比孟浩然好得多。张子容“奢华”的招待行为很容易被“机警”的孟浩然理解为他对自身处境的矜持,或者是对孟浩然的含蓄反驳,故而他要特意加以解释——虽然这一解释显得有些欲盖弥彰。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很可能与张子容对孟浩然“机警”个性的了解有关。

与“通脱倾盖,机警无匿”相应的是,孟浩然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注重情感的真诚流露,而拒绝行为上的刻意与矫饰。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

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sup>⑪</sup>

“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即指孟浩然在交游之中任由真情流露,而不进行有意的情感表现,故而有时候给人怪诞之感。另外,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提及孟浩然与张九龄、王维、裴朏等人为“忘形之交”。<sup>⑫</sup>“忘形”也就是“行不为饰”,两者都指向“动以求真”,即情感的率性、真诚流露。

孟浩然人际交往中的“行不为饰,动以求真”并非泛泛的行为艺术,而是经过了得失乃至生死的验证。据王士源记载,山南采访使韩朝宗十分赏识孟浩然,相约入京予以举荐。但到了约定时间,孟浩然却与寮友文酒讲好甚适:

或曰:“君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sup>⑬</sup>

在这则轶事里,孟浩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因为意气相投而倾心相待,以致不惜放弃自己的前途。这样的率性、真诚绝非刻意表现的深情所能相比。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还记载: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sup>⑭</sup>

因为与王昌龄“相得欢甚”,孟浩然“浪情宴谑”,完全不顾自身的疾病,并最终因此失去生命。这种极端的率性交往,恐怕任何刻意的情感表达都不能企及。由此可见王士源对孟浩然“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的个性概括并非泛泛虚语。

孟浩然“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的个性体现在其社交文字中,首先就是对自身情感的直接表达。上引《送张子容赴举》可为一例。另外还有流传甚广的《送朱大入秦》:“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sup>⑮</sup>诗人对自己的热烈情感不遮不掩,表达得痛快淋漓。同样的例子还有《大堤行寄万七》中的“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中的“感咏复何为?同心恨别离”,《夏日南亭怀辛大》中的“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等<sup>⑯</sup>,其情感表达也都深沉、热烈而且直接,是其率性、真诚的突出表现。

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孟浩然的“行不为饰,动以求真”还表现为对自身情感的有意压抑,即通过隐藏或抑制情感的方式来表达更为深刻的真情。如其《秋登万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sup>⑰</sup>

这是诗人主动投寄给张五的诗歌,暗示了其情感的主动与热烈。但诗人并没有将这种热烈的情感转化为直接去看望对方的举动,而是采取了看似淡漠的登高远望姿态。“登高”意味着其情感的表达更加隐蔽、含蓄,难以被对方直接感

知。这是诗人对自己热烈情感的有意压抑。这种自我压抑实则是源于对“隐者自怡悦”这一文化传统的着意尊重：宁可登高相望，也绝不前往打扰。这里显然蕴含着更为深沉动人的情感。再如其《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回潭石下深，绿筱岸傍密。鲛人潜不见，渔父歌自逸。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sup>⑥</sup>

诗人在诗歌中回忆起自己与对方共度的美好时光：面对“夕阳开晚照”的壮丽景象，两人情怀激荡，所兴非一。但诗人与朋友心中的诸多之“兴”都没有直接表达出来，而是被压抑在“中坐”的姿态里，显得格外深沉而内敛。孟浩然在投寄诗歌中主动回忆起这一场景，显然是试图向对方表达自己对两人当时不约而同地压抑激情的深刻共鸣。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中，孟浩然因为对所处环境的满足而想起了皎上人。“即事”寄诗本身就意味着情感的随机与勃发，同时也意味着情感的真诚和强烈。但孟浩然最后的情感表达却较为平淡：“书取幽栖事，还寻静者言。”<sup>⑦</sup>似乎别无它意，只是想与对方分享一些独特感受。显然，孟浩然在这里也着意压抑了自己的情感表达力度。

孟浩然对自身情感的有意压抑看似与其“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的社交个性相悖，实则适为统一。这是因为，在通常的人际交往中，向对方表达友善、亲近之意，借以建立或加强彼此间的情感交流，这是通常的社交准则。然而这也往往导致社交活动中情感表达的矫饰与浮夸。王士源强调孟浩然“行不为饰”，正好从反面说明当时人际交往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饰”的现象。上述李白的行为就是其中的显例。孟浩然对自身情感的有意压抑，正是对这种“饰”的矫枉过正，而且孟浩然的这种行为并非孤例。宇文所安认为，王维的大多数诗歌都存在着一种“抑制法则”，抑制的背后隐含更深刻的意义或更强烈的感情。<sup>⑧</sup>他指出：

王维无法以自然的感叹和激情反对宫廷诗的虚假感叹和激情，而是以对虚假感情的真正否定——无感情来反对这种危险。如果有真实感情要表达，就必须把感情藏起来，但只能是寓于言外，而不是公开表达中的矫揉做作，吞吞吐吐。<sup>⑨</sup>

孟浩然对情感的有意压抑显然与此类似。这很可能也是他与王维能够交友深厚的原因之一。在人际交往中，他们都更在意彼此间的默契于心与内在共鸣，会通过自觉的压抑而警惕、否定任何行为上的“饰”，以追求情感表达的真诚。这显然与孟浩然“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的社交个性在精神旨归上高度一致。

综合上述，孟浩然表现出了“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和“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等主要的社交特点。他一方面非常敏感，另一方面非常也在意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真诚。二者互为因果，迭相推进，总体上归结为对于交往真诚的强烈追求。不管是不计得失、生死的率性投入，还是对自身真情的有意压抑，其本质都在于此。由此不难看出孟浩然的性格特征。

#### 四

从上文的探讨可以看出，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看似深情、热烈，实际上都出于蹈袭，带有矫饰色彩。而李白的这些矫饰不仅不能被“机警无匿”的孟浩然轻易感知，而且适与孟浩然“行不为饰，动以求真”的社交个性尖锐对立。因此，不管孟浩然对李白的热情未作回应带有多少偶然因素，两人的不能深交都带有必然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李白社交的失败。

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李白社交个性及其效果的反思。直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热烈情怀是李白通常采用的社交模式。但从王维、孟浩然对情感表达的有意抑制以及王士源对孟浩然“行不为饰”的评价来看，这一社交模式的效果在当时已经不太乐观。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李白甚至没有真正把握到这一社交模式的精髓：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强化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热情，还有对这份热情的真诚。如果热烈的表达发

自衷心,自然会得到他人的积极回应。然而李白表达热烈情怀时的蹈袭和模式化处理都极其草率,这严重削弱了其情感的真诚与深度。上引《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赠孟浩然》就是显例。<sup>⑩</sup>可以想见,李白这样模式化的热情表达会很容易被人识破,甚至带来反面的社交效果。这种社交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遭际,显然就成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在通常的诗人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强调诗人的抱负或才华,并将其仕途的失败主要归结于社会或时代,而较少考虑社交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社交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能力也是个人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影响其一生出处成败的重要因素。对于唐代士人来说,由于朝廷实行科举与荐举并存的取士制度,交游、干谒、行卷等社交方式成为他们获取社会资源、实现人生目标的主要手段<sup>⑪</sup>,优秀的社交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李白如此,孟浩然如此,所有唐代士人一生的出处莫不关涉于此。循此出发,则关于唐代诗人的研究,或者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探讨向度。

注释:

① 可参见房日晰:《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② 李白称孟浩然为“故人”,两人甚至有一批共同朋友。孟浩然与其他人多有酬答,但不及李白。可参见郁贤皓:《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载其《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一卷),第236—239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集序”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参见卞健行:《从李白〈赠孟浩然〉看李白对孟浩然的认识》,《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⑤ 见詹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7卷,第12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可参见左汉林:《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阮堂明:《始于蹈袭而终于超越——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3期。

⑦ (明)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陈继儒语。关于引文及前人的推崇,参见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12卷,第1857—1859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⑧ 见俞陛云:《诗境浅说》,第176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⑨ (清)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⑩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此诗标题与正文中“广陵”

与“扬州”的矛盾。大多数学者为李白辩护,认为唐代的“广陵”就是“扬州”。见文华珍、周宗旭:《〈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广陵”与“扬州”》,《文史杂志》,2014年第2期。即便如此,李白为何要在标题与正文中用到这两种不同的地名,仍然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诗歌的头两句来看,“扬州”代替“广陵”,显然是为了与“黄鹤楼”勾连,引出“骑鹤下扬州”的典故。这同样带有为文造情的嫌疑。另外,如果考虑到李白此诗是对其旧作“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的蹈袭,则这首作品中的“深情无限”更加令人怀疑。

⑪ 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卷,第986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⑫ 参见阮堂明:《始于蹈袭而终于超越——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3期。左汉林也指出了这首作品的蹈袭色彩。见其《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⑬ 关于《江夏行》的创作时间,安旗认为是在开元十三年,见其《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43页,巴蜀书社1990年版;詹锜以为或作于开元十六年,见其《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7卷,第12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般认为创作于开元十六年,但也有开元二十五年、十五年之说。可集中参考郁贤皓:《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载其《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一卷),第232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辉斌:《孟浩然与李白交游考》,《襄阳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吕华明:《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⑭ 见阮堂明:《始于蹈袭而终于超越——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读》,《名作欣赏》2007年第3期及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第6卷,第987—988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⑮ 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包括《莫愁乐》及《三洲曲》等。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47卷,第68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⑯ 詹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8卷,第12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⑰ 见(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续集”,第1卷,第8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⑱ 可参见房日晰:《李白崇尚孟浩然的缘由》,《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许志忠:《“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李白推崇孟浩然原因探源》,《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⑲ 参见卞健行:《从李白〈赠孟浩然〉看李白对孟浩然的认识》,《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⑳ 见(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第8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㉑ 徐鹏校注:《陈子昂集》,第1卷,第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㉒ 见吴明贤:《李白与陈子昂》,《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㉓ 《新唐书》,第107卷,第407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㉔ 罗庸认为陈子昂《感遇》不是一时一地所作,陈子

昂不可能以《感遇》三十八首被王适所知,旧、新《唐书》乃是改动了卢藏用的《陈氏别传》。但这并不排除陈子昂早年以部分《感遇》诗知名的可能。罗庸观点见其《唐陈子昂先生伯五年谱》,第1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②⑤参见白贵、李朝杰:《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②⑥(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第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另可参见熊飞:《张九龄集校注》,第2卷,第17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⑦见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2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⑧见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第2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⑨詹锜、郁贤皓均认为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七年。见詹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8卷,第12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郁贤皓:《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载其《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一卷),第234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安旗等人虽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六年,但也认为是在孟浩然辞去张九龄幕府之后。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320页,巴蜀书社1990年版。刘文刚则以为在开元二十三年。见其《孟浩然年谱》,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⑩参见李翰:《试论孟浩然其人其诗的“拙”》,《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蔡阿聪:《孟浩然的性格与其人生悲剧的关系》,《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肖兰英:《品格狷洁诗清妙——试论孟浩然的个性品格及其诗作的影响》,《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第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⑪见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序”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⑫见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序”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⑬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中说两人“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见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⑭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3卷,第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⑮张子容有《贬乐城尉日作》。见(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第23卷,第76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⑯张子容:《除夜乐城逢孟浩然》,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附录”,第3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⑰《世说新语·识鉴》载:“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见(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47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⑱孟浩然:《除夜乐城张少府宅》。见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3卷,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⑲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集序”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⑳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集序”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㉑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集序”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㉒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集序”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㉓见徐鹏校注:《孟浩然校注》,第4卷,第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㉔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1卷,第21页、第27页、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㉕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㉖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1卷,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㉗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第1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㉘见(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第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㉙见(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盛唐诗》,第4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吾爱孟夫子”这样热情的表白对于李白来说可能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情感内涵,而仅仅只是一个交际模式。他在《赠崔秋浦三首》第一首中说:“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在《感遇四首》其一中也说:“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分别参见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第8卷、第1292页,第21卷、第3081页,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㉛可参见薛天纬:《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程千帆全集》第8卷,第5—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责任编辑:陈建宁)